

桂东文史

(征求意见稿)

第 六 期

桂东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一九八七年九月

胡云翼在抗日战争中

——记几则难忘的片断

浙江海宁 褚克昌

胡云翼先生湖南桂东人，早年毕业于武昌大学，工诗词，是南社后期诗人，研究唐诗宋词，著有专集；所作小说，清丽动人，结集《西冷桥畔》，《支那妇人》曾选入教科书中。抗战前，曾任中华书局编辑、上海暨南大学教授，与严北溟同称“湖南才子”，是一个地道的文弱书生。抗日军兴，他不随校南迁，而驻足于钱江南岸的绍兴，担任政工队长。我任第二区队长，在政工队二人相识了。

一九三八年春天，上海已成“孤岛”，浙西地区复为敌后，钱江南岸成了东南抗日第一线。我因奔丧，失去了随校南迁的机会，流亡在绍兴，参加战地政工队。这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引下的青年抗日组织，每人月发生活费十二元，上下一律，无分高低。这时，胡云翼担任三区（浙江省绍兴专区）政工队的副总队长，战地政工队是三区政

工作队的一部份，也属胡云翼领导。

战地政工队第二次挺进浙西敌后，胡云翼随队同行，担任我们的队长，曾任浙江省抗敌第五支队政训队长。于是，我们生活在一起，工作在一起，战斗在一起。

以后，他任浙江省政工第二六队长时，我任四队第一区队长；他当绍兴县长时，我任县青年服务队队长；他任嘉兴县长时，我任县府秘书，后调任嘉区《民国日报》总编辑。解放前分手，共事达八九年之久。

在十年动乱中，胡云翼先生含冤去世了。他的神采英姿仍时刻萦回于我的脑海，特别是他在抗日中的几则片断，使我终身难忘。现经厘正整理，分别缕述于下，以寄托对他的哀思。

在敌伪的夹缝中

敌后斗争无疑是十分艰险的，我们在第四支队这支并不精悍的武装掩护下，开展宣传抗日争取民心的工作。胡云翼经常部署具体工作。他斜背一支装在本盒子里的驳壳枪，走路犹似庭前信步，一派文人风采。毫无一点武夫的架势，但却具有军人的胆量。在浙西敌后斗争十个月中，他写下了不少诗篇，留下更多的是对敌斗争的史迹：他率同妇女营夜袭沪杭线上的据点王店；他参加了浙西有名的含山反扫荡战；在敌伪夹缝中举办“浙西青年训练班”，争取沦陷区青年，壮大了抗日队伍，在德清新市办《浙西时报》，在桐乡屠甸办《浙西导报》，艰难而又巧妙地避过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搜索和扫荡。竖立起两面抗日的鲜明旗帜。抗日流动小学如雨后春笋般地崛起于杭嘉湖平原之上，儿童不但有书读了，而且是一支出色的抗日宣传力量……从此，死寂了的浙西沦陷区，不但响起了杀敌除奸的枪声，也响起了抗日救亡的歌声。

胡云翼以文人的智慧和军人的胆量，导演着一幕又一幕的惊险斗争活报剧。

西塘桥遇敌

胡云翼与五支队的李健大队长到乍浦方向去工作，带四名卫士，乘一条小木船从水道走。

杭嘉湖是河汉地带，船出这条汉又进那条浜，曲曲折折进行，很安全。但是，通过西塘桥必须要过一段官塘大河。小船一出河浜，猛听见汽艇声，想掉头已经来不及了。汽艇上的日寇在向小船打招呼，李健和四名卫士都拔出了枪。胡云翼急令靠岸，岸上有一幢单独的茧行，汽艇直扑过来，枪声响了，且战且退，寡难敌众，李健和四名卫士都牺牲了。胡云翼臀部受伤，便趁势躲进了茧行的夹墙中。敌人没有弄清楚有多少人，收缴了五支枪，点了点五具死^尸体，便启艇走了。老乡来收殮死者时，胡云翼才被转运到政工队驻地——火烧桥治疗。

敌区治伤

乍浦有个巨绅叫徐梅仙，原是“维持会”的后台人物，与一个日寇“太君”攀上交情，常来常往。自从杭嘉湖响起了杀敌除奸的枪声，他的态度开始有了转变，变一面倒为脚踏二头船，既维持日本兵，也招呼游击队。胡云翼的伤势一天比一天恶化，自己队伍里的医疗条件差，于是考虑到敌区去治疗。与徐梅仙一接头，他满口答应，说住在他家保险。于是胡云翼乔扮成商人，由徐梅仙接进了乍浦镇，医疗条件大大的改善了，重要药材全从上海购来，没有多久伤势大有好转，我们准备接他出来。徐梅仙为了放点交情，一定要设宴送行。那天晚上正酒过三巡，日本“太君”突然驾到，还带了一班兵，说是来搜查支那兵的。徐梅仙忙邀请入席，说老朋友明晨去上海，今晚便酌送行。胡云翼也相应地作了些礼貌性应酬。“太君”却说军令在身不能奉陪，急匆匆带兵走了。

事后，“太君”搜查支那兵，一直成为笑谈。

红萝卜的比喻

政工队的同志们常被人称做“红色份子”，因为，他们喜读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》、《社会发展史》、《自然辩证法》等

书，又喜欢唱《丈夫去当兵》、《红缨枪》、《黄河大合唱》……等歌。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浙西办事处的老爷便把黑手伸进来，提出一张黑名单，要浙西行署协同办理。行署主任贺扬灵邀集有关人员商讨。胡云翼在会上打了一个比喻说：“这批年轻人，实质上都是红萝卜，外表看是通红的，剥开来全是白的。”当时博得与会者一阵笑，问题便搁下了。

红萝卜的比喻，保护了不少同志。

难忘的山药蛋

一九四一年，绍兴沦陷了，残局不堪收拾。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很自然地想起了胡云翼，因为他在绍兴工作过，人事、地理都很熟悉。要他去当县长，收拾残局，认为是很恰当的。胡云翼受命于危难之中，向行署借了一大队兵，匆匆上任了。

初驻黄坛，这是一个山区小镇，精华之区全在塘北水乡。没有精强的武装，休想越雷池一步。要搞武装谈何容易。需要大量的人和钱。胡云翼只得徐图开拓。“金义会战”前夕，海匪出身的王阿宝伪军，仗敌人势焰，踏遍了绍兴的山村。胡云翼连黄坛也坐不住了，避走会稽山下的一个更小的村落——陈村，把仅有的一点武力驻守在山脚下，不带枪的人直上山顶岭头。岭头山户七家，终年吃自产的山药蛋，我们初用咸菜卤烤了吃，味同栗子，很是好吃；日脚长了，胃口倒了，越吃越少，为了果腹，只好一个一个勉强挨下去。半月之后，才下山食“人间五谷”。严酷的斗争生活考验了我们，更考验了胡云翼和他的夫人赵渾秋。

在敌机轰下

胡云翼在抗日战争中遭到过两次敌机轰炸：一次在海盐；一次在天目山。

海盐在浙西敌后，一个敌人尚未占据的县城。胡云翼领导的三区战地政工队就驻在城东稍头的张家祠堂里，“浙西青年训练班”也注

此，第五支队司令部驻在城郊。这座县城没有一点防空设备，市面畸形繁荣，每天熙熙攘攘，热闹非凡。敌机来轰炸那天，正是“浙西青年训练班”结业。突然瞭望台送来几声尖厉的哨声，在张家祠堂里的同志已来不及走避了。接着爆炸声四起，十二架敌机轮番轰炸达一小时之久。张家祠堂隔壁的冯家花园里的一株大桂花树被震过墙来，横躺在进门的天井里，围墙开了一个大缺口。我从外面跑进来碰到胡云翼从里面走出来，互问情况，幸好同志们都安全无事。胡云翼便组织抢救队上街。熟悉的街道全变了样，跨市河的石桥被炸毁了，桥下的几间小屋不见了，曲尺街被炸直了，电线上挂着血淋淋的肠子，断肢残体随处可见，从救熄的房屋里，我们还听到婴儿的啼哭……海盐被炸毁了半个城，死伤的无辜市民难以计数。

第二次是在西天目山，当时胡云翼担任浙江省行政干部训练团浙西分团的教育长，驻在朱陀岭上。两架敌机轰炸的目的是浙西行署。行署倒没有受难，古刹禅源寺的大雄宝殿被炸毁，朱陀岭无恙。

队员之家

胡云翼领导浙江省政治工作第二大队，是由他担任队长时的三区政工队扩组而成的。在天目山集训时，编入了谈益民领导的一个兵站医院的流亡青年，大批由“浙西青年训练班”结业的学员，又有一些不堪当地反动势力迫害的县政工队员来投奔，如新昌来的叶宗淦，宁波、定海方向来的李默君、丁菲，还有义乌来的好几人（姓名已忘）。省政工第二大队对来投奔者，一概接纳，并允许来去自由。所以乍看起来“成分比较复杂”；但是从未闹事，工作都很积极，有的同志竟为抗日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，如叶宗淦、沈清华等。同志们对省政工二大队视同自己的家，人人从中感受到集体的温暖，直到政工队被解散为止。

欢迎三五支队

胡云翼担任绍兴县长，也是受命于危难之中。原绍兴县的武装方

量已全部崩溃，只剩下一个警察局长带着为数不多，武器残缺的几十个保警战士，自卫力量十分薄弱。境内敌伪势力猖獗一时。基于这一客观事实，胡云翼对抗日部队，不分派系，一律靠拢交往。有一天，他要我派人去黄城镇欢迎三五支队，三五支队是四明山游击队的一部份，从三北地区转移到诸暨枫桥方向去，路经绍兴县境，胡云翼得知后，即通知黄城镇公所早备茶水招待。待我赶到黄城，三五支队绕道黄城镇郊已去枫桥，只派几个政工人员来道谢，我们虽未会面，甚感亲切。

青年党之“迷”

抗战胜利之后，胡云翼当了嘉兴县县长。

有一次青年党的头头陈启天、左舜生、崔万秋来嘉兴游南湖，胡云翼盛情款待了他们，于是在浙江的政界里传出一个“内部消息”：说“胡云翼将出任浙江省政府委员，是青年党提的名”。“胡也是青年党头目”。盛传一时，成了一个“迷”。

我趁单独见面的机会，询问了这件事，胡云翼说：“陈启天、左舜生是中华书局编译所的同事，我们之间只有友谊没有政治。”

后来，胡云翼辞离了嘉兴县长。这条“内部消息”原来是政治倾轧的讯号。

朱孔扬啸聚山林

李本杰 龚集贤

朱孔扬，绰号朱聋子，湖南祁阳人。原是湘军第六混成旅陈嘉佑部驻进桂东时第九团某连连长。后来落草山林，成为湘赣边界早期的绿林武装首领之一。我俩现将亲闻或目睹朱孔扬的一些活动，作如下历史追述。

桥头起事 落草山林

一九二〇年，陈嘉佑赴广东受编后，一部分队伍被解散。朱孔扬便领着部分散兵游勇十余人，持枪九支，移驻桥头，号称检查所。经常在上堡（桥头）局里出出进进。当时，宝庆（祁阳）商人在我县做鸦片生意的不少。干这一行，本钱大，要担风险。朱便与他们合伙贩卖鸦片，设卡收税，做他们的保镖，大肆搜括，劣迹累累。桥头一带的老前辈有句骂人的话，说：“你恶得象朱孔扬一样”。

在那兵荒马乱，匪盗横行，农村经济萧条的年代，朱孔扬就过着荒淫无耻、大吃大喝的糜烂生活。他用钱如水，经常从祁阳老家请来戏班子在桥头圩唱戏，看到兴高采烈的时候，叫人用箩筐把花钱（铜圆）抬出来“打采”（用硬币往采旦身上或脸上打，叫打采）。花钱打完了接着用银毫打。

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间，朱孔扬派了几只枪，护送十多担鸦片运往江西出售，路经遂川淋洋，天晚歇于马场伙铺中，被当地流氓、劣绅古采唐勾结一班无业游民，深更半夜，将他的鸦片抢夺一空。原想赚笔大钱，却落得本倒利绝。气得朱孔扬脸色发紫，鼻孔里出气不赢。

当时，三部分桥头、尚义、崇正三个乡。三个乡的团总都是贪得无厌之徒，利欲熏心之辈。朱与他们沆瀣一气，臭味相投，经常混在一起，如胶似膝。这次朱便与他们伙商，假借团局的名义，向当地派捐索款数千元，限期缴纳，以弥补他经营鸦片的损失。三个乡的乡民

郁愤愤不平，联名向县里控告他们私自勒捐的非法行为。知事陈洪范将这三个团总拘捕。朱见势头不对，怕祸临己身，终日惶恐，坐卧不安。于一九二一年九月，狗急跳墙，纠集一些亡命之徒，喝雄鸡血酒，结盟起事。当即抢劫尚义枪支、弹药。纠合二十余人，枪十余支，身穿杂衣，头裹青布，途往江西大汾抢劫，当晚返桥头宿营。十月初，率领所部开赴遂川淋洋，一意打算捉拿古采唐，追回被他抢走的鸦片，取消宿怨。结果扑空。临走时，烧了几栋民房、庙宇、捕走郭建元、郭调元、郭仁亨、薛杜月等四个无辜百姓，返回桥头，勒钱取赎。从此，他凭藉手中掌管的枪支，和一伙强徒，宿露深山野岭，经常在我县和遂川、宁岗、鄱县一带“吊羊”。把那些富豪绅士弄得倾家荡产，东躲西藏。连一般穷苦百姓也难免遭殃。

绑票吊羊 扩大武装

十一月一个深夜，朱孔扬将李自善、李蔚林和李蔚林的老婆、媳孙媳绑走带到石门，关在“羊棚”里。并在李宅门上张贴罚款数额，和限期交款赎人的告示。李自善、李蔚林都是当地有钱有势的豪绅，他的家人立即请来县署官兵数百人进剿。无奈朱孔扬在深山老林与他们转圈周旋，一明一暗，结果官军损兵折将，弃枪而返。朱孔扬不仅无损，反获枪支数十支。李家无奈，知肖访于与朱队伍里的石自成有一面之交，便请肖当代表，经几次交涉，讨价还价，最后只好花钱赎人。最后，朱孔扬又收集散兵游勇，扩充队伍。两年后便成为拥有一百余人枪的绿林队伍，自封“朱司令”。

石自成也是祁阳人，长期往来桥头贩卖鸦片。他原来本钱丰厚，遭朱孔扬抢劫后不能还乡，于是以朱为师，招集逃兵数十人，啸聚山林。江西与我县交界地方骚扰，后觉得自己势单力薄，难以生存，又携同肖访于，以同乡关系和朱孔扬一起，与别处三都盘踞的邓承庭等合为一股。从此朱孔扬发展成为一支拥有人员三百，枪二百支的绿林武装。

王佐投靠 分道扬镳

朱孔扬盘踞湘赣边界，四出“吊羊”，将得来的大批布匹，请井冈山裁缝师付王佐去做衣服，从此便与王佐混熟了。

苦大仇深，血气方刚的王佐眼看绿林四处崛起，喜上眉梢，他感到参加绿林才有奔头，“吊羊”既可解恨，又可得钱，认为这是除霸雪恨的好机会，特别是当他看到朱孔扬的部下，人多势大，遂于一九二一年毅然投奔朱孔扬门下。

朱见王佐机智灵活，精明能干，武艺高强，而且土生土长，又走过湘赣边界各县的大小山村，对这些地方的情况十分熟悉，是难得的一个湘赣边界的活地图，就要王佐充当水客，专做采买和侦探工作。由于王佐完成任务出色，常常得到朱孔扬的赏银。但时间一长，他看到绿林军每次“吊羊”之后，那种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大把分钱的快活生活，虽然都有自己的一份。但朱孔扬除了吊土豪索财之外，每到一处，对贫苦百姓也不放过，不是抢劫财物，烧屋杀人，就是奸淫民女，使得当地父老怨声载道。踌躇满志的王佐，觉得这样寄人篱下混下去，终究不是个办法。于是他将朱孔扬赏给的银钱积累成六十块银元，从广西军阀逃兵手中买得一支九响烂枪，回到下庄邀集了十几名好兄弟，共喝鸡血结盟，另立门户，自称营长，独树“劫富济贫”的旗号，与朱孔扬分道扬镳。

率部破城 抢劫财物

朱孔扬落草以后，转徙在湘赣边界的崇山峻岭中，对桂东更是“熟地难忘”，对陈洪范也宿怨未销。一九二二年，正是军阀割据，政局变幻莫测的时候，各色军队在桂东常来常往，县城武备不修，时虚时实。朱孔扬、石自成伙结前第六混成旅检查所经理谭立生等人，于六月十五日（8月7日），率部四百人攻城。由遂川七岭关口出发，半夜经寨口，天刚破晓到达城郊，仍未敢擅入。见城内虚若无人，即疾驱城东，

蜂拥而至。一时枪声大作，喊声震天，城内乱成一片。县署岗哨方亮中被马刀砍死，身受七刀，血流满地；王用材来不及逃脱，在头门右厢房中弹，死尸靠在水樟上。警备队丢下枪支，抱头鼠窜；百姓呼号转徙，东奔西窜。陈洪范从睡梦中惊醒，惊魂落魄，无所措施，衣冠狼狈，以破笠遮颜，夹杂在群众当中，才得以逃脱。一个月后才回来。县财产保管处学校机关以及市店、民舍抢劫一空。县公署原有警队快枪十五支被劫去。掠去商人李逢春、李汉英等勒款取赎。打开监狱，放走十余名。纵火焚烧衙署。朱部从天亮进城，至九点钟左右撤走，经桥头出江西，满载抢劫财物扬长而去。整天市民惊魂不定，农民不敢进城，商店关闭，街道不见人影，没有买卖交易。

这次扑城，朱孔扬没有“吊”到陈洪范这只大“羊”，仍不甘心，于农历九月十九日（11月7日），又率百余人，枪七八十支，盘踞在资兴与桂东交界之处藻坪，后由陵县走渣场地方，直抵吊谷上仓，窥伺四都，希图就乱全邑。团局闻警飞报，商请驻防军进剿：农历二十八日（16日），周知事会同四团刘、戴两连长亲督警团，前赴四都，刘连由齐云亭经蜈蚣岭前进，戴连向桃寮前进；二都团兵驻猪婆嘴，一都团兵专防油茅岭，团局出防沙田；知事经由寨前、沙田、四都，召集团警驰抵县之吊谷上仓地方，截朱部过湖南之路；还函请资兴县王知事，调彭公庙等处团兵，分路堵截，形成合围之势。旋接戴连通报，戴连“于农历十八日（30日）午后三时，与匪遇于桃寮，前方激战二时。匪势不支，退于资、桂交界之烂泥湖。”后来，朱孔扬又乘县里的警团不备，以小股出动，到观音桥抢劫鸦片十余担，抄小路而逃。

途穷来路 瓦断砖碎

自朱孔扬扑城以后，我县“沦为兵匪往来之区”。这年冬，又从省里请来官军。由陆军第一混成旅叶开鑫指派其第二团刘团长率部到县追剿。朱部从汤湖、营前潜至下丹，正好与官军在鹅颈遭遇接火。这群乌合之众，只凭抢劫“吊羊”渡日，险山恶水藏身，不能打仗。所以，一击即

溃，狼奔豕突，朱孔扬连坐的轿子也丢了，经烟筒隘败走江西，落荒遂川圭洞、淋洋。将抢来的衣服、布匹……等丢得一路狼籍。

二十年代初开始，集结在湘赣边界的绿林武装，大大小小的有几十股。这块地方山势险峻，人口稀少，物产丰富。这些绿林武装：有的因官长克扣军饷，士兵哗变，拖枪潜逃；有的因南方军阀败北，各自谋生；有的是生活绝境的贫苦农民义无反顾，揭竿而起。都是以“吊羊”为生，但各树一帜，各行其事，争权夺利，互相残杀。

一九二三年，驻守在我省的北洋军阀一部哗变，由营长唐光跃带百余人上了井冈山。唐为供养他那支百余人的队伍，把边界周围各县的富户豪绅变成他捉人罚款的主要对象。而朱孔扬在这一带日趋势众，碍手碍足，成为与他们争夺的主要对手。结果两股绿林互相角斗，火拼数月，朱孔扬被唐斗垮。于是率领残部移驻旗锣场，又接连几次遭到官兵追剿。朱又流落到宁岗的斜源村。结果兵逃枪丢。朱孔扬无奈，于一九二三年秋，只好只身携带部分财物潜逃。

资料来源：

一、《桂东县会议报告书》。

二、周润标《半学山房遗稿文集》卷上第四十、四十一页，卷下第十二、十八页。

三、《井冈山文史资料》李蕊珍《王佐的一生》，李春祥《井冈山绿林》。

四、政协遂川县文史资料委员会《来信》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二日。

五、“朱孔扬破城”座谈会发言纪录。

六、郭涛《调查纪录稿》一九八五年元月三十一日。

七、李布、肖铭阁供稿。

八、访方衍祥老人的谈话纪录。

九、陈家桂、谷定雄、张福星、方伯安等老人的回忆。